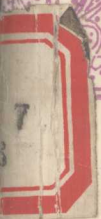


新时期文学

汪时进 吴文祥主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新 时 期 文 学

3.11

主 编 汪时进 吴文祥

副主编 黄树红 祁念曾 李正西

河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冀)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 彭黎明

封面设计 岩 蒲

新时期文学

汪时进 吴文祥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 071002 电话: 222929—58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〇五印刷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1,125字 数: 28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81028—098—8 /I·14

定价: 6.50元

前 言

从1976年10月至今，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时期文学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指引下，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真实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伟大步伐，取得了全面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揭开了辉煌的一页。

我们编写本教材，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新时期文学不论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也不论在主题的深刻性还是题材风格的多样性上，都超出了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呈现出一个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新时代。所以，独立而系统地认识和评估这一阶段的文学，已成为对新时期文学总体回顾梳理和促进其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其二，新时期文学是广大学生最易感知和理解的，也是他们最热切希望参与的文学大潮，这就要求文学史的教学，更应贴近当前文学发展的实际。其三，近几年来，虽陆续出版了一些当代文学教材，但专门论述新时期文学发展状况和作家作品的尚不多见，且在时限上多止于八十年代中期，给新时期文学留下较长的空白。因此编写《新时期文学》这样一本教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本书按照体裁分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四编，每一编又分成若干章，将宏观的概述与微观的作家作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清晰地展示出新时期文学的演变规律，把握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

新时期文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我们应紧紧跟踪它的发展轨迹，对文学的现状作准确而科学的评析，同时，在如何

建立新时期文学的学科体系，改进教材体例方面，也向广大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提出了急迫的任务。这本《新时期文学》教材，就权且当作我们力不从心的成果，奉献给新时期文学吧。

本教材是集体编写，在内容的详略、专题的确定、重点的选择以及文学风格的统一诸方面，难尽一致，又加时间仓促，误漏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敬请批评和指正。

编者 1992年7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小说创作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王 蒙 刘心武 蒋子龙	(10)
第三章	张贤亮 从维熙 李国文	(25)
第四章	汪曾祺 陆文夫 方 之	(36)
第五章	李 準 高晓声 张一弓	(45)
第六章	邓友梅 冯骥才 林斤澜	(53)
第七章	贾平凹 路 遥 张 弦	(62)
第八章	刘绍棠 古 华 周 芹 潞 然	(72)
第九章	徐怀中 李存葆 朱苏进 莫 言	(81)
第十章	湛 容 张 洁 宗 璞	(93)
第十一章	王安忆 铁 凝 张抗抗	(101)
第十二章	张承志 邓 刚 梁晓声 阿 城 史铁生 陆天明	(109)
第十三章	刘索拉 徐 星 刘西鸿 残 雪 苏 童 金 华	(124)
第十四章	池 莉 方 方 刘 恒 刘震云	(139)
第十五章	姚雪垠 凌 力	(147)

第二编 诗歌创作

第一章	概述	(152)
第二章	艾青及“归来”的诗人	(160)
第三章	七月诗派和“九叶”诗人	(171)

第四章	李 瑛 张志民 蔡其矫的诗·····	(182)
第五章	雷抒雁和杨 牧 周 涛 章德益 的新边塞诗·····	(192)
第六章	舒婷及“新生代”诗人·····	(205)

第三编 散文创作

第一章	概述·····	(216)
第二章	巴金的散文·····	(223)
第三章	孙犁的散文·····	(231)
第四章	冰 心 丁 玲 杨 绛的散文·····	(237)
第五章	赵丽宏 李佩芝的散文·····	(246)
第六章	徐 迟 理 由的报告文学·····	(255)
第七章	黄宗英 柯 岩的报告文学·····	(260)
第八章	陈祖芬 孟晓云的报告文学·····	(266)
第九章	李延国 钱 钢的报告文学·····	(271)
第十章	廖沫沙的杂文·····	(278)

第四编 戏剧、影视创作

第一章	概述·····	(285)
第二章	王景愚 苏叔阳 宗福先·····	(293)
第三章	白 桦 丁一三 沙叶新·····	(299)
第四章	崔德志 赵梓雄 梁秉堃·····	(306)
第五章	曹 禺 陈白尘 颜海平·····	(313)
第六章	高行健 锦 云 魏明伦·····	(319)
第七章	马少波 顾锡东 郭大宇·····	(325)
第八章	谢 晋 赵焕章 颜学恕·····	(332)
第九章	吴天明 张艺谋 陈凯歌·····	(337)
第十章	龙小刚 黄蜀芹 鲁晓威·····	(342)

第一编 小说创作

第一章 概 述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创作从十年动乱时期的“冰封”状态经过复苏和振兴，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新时期文学，在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写下了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小说，在整个新时期文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创作成果之丰硕，作家队伍之壮大，社会影响之广泛，为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及。

短篇、中篇、长篇，是小说家族中的“三姊妹”。鲁迅把长篇小说称为“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式的文学，而认为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便捷、易成”，篇幅虽小，但“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由于短篇小说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往往是短篇小说这个文学的“轻骑兵”首先活跃起来，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新时期文学的情况正是如此。首先是短篇小说的活跃，接着出现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和长篇小说的丰收，形成了短篇、中篇、长篇三种主要的小说样式各显其能，各呈其巧的局面。《班主任》吹响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声号角，此后佳作竞相发表，创作硕果累累。茅盾生前曾对短篇小说创作情况做了高度评价，他

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春满文坛。作家们解放思想，辛勤创作，大胆探索，短篇小说园地欣欣向荣，新作者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建国三十年来，曾未有此盛事。”（《小说选刊》发刊词）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向默默无闻的中篇小说异军突起，不仅数量直线上升（仅1982年即创作出六、七百部，相当于建国后17年的总和），而且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作家队伍日益扩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中篇小说在新时期的迅猛崛起，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出现的，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审美需求而结出的果实。同时，中篇小说的勃兴，是由这一文学样式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它的篇幅比短篇小说长，生活容量较大，而与长篇相比，它又具有创作周期较短，反映现实较为快捷的长处。因此，当新时期之初，作家们面对现实，反思历史，并把自己深沉的思索和探求见诸于文字之时，便很自然地选择了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此外，大型文学期刊的不断涌现，为中篇小说提供了比较广阔的阵地，也对创作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短篇的活跃，中篇的崛起，长篇小说也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长篇创作总数逾千部，超过前半多个世纪长篇小说的总和。同时，题材更加多样，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更加深广，其表现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仅就获得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四部长篇小说而言，既有揭露“文化大革命”、批判“左”倾思潮危害的作品（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又有近距离反映当前社会改革的小说（张洁《沉重的翅膀》、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既描绘了八十年代五光十色的城市风景线 and 市民风俗画（刘心武《钟鼓楼》），又展现了黄土高原上的那一片充满艰辛、苦涩和希望的平凡的世界（路遥《平凡的世界》）；既出现了历史题材佳作（姚雪垠《李自成》、凌力《少

年天子》），又艺术地再现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魏巍《东方》、刘白羽《第二个太阳》），还展示了独呈异彩的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小说创作的繁荣兴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正确，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人，得到了解放。作家们辛勤笔耕，文学新人不断涌现，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小说家大军。在这支队伍里，有“五四”期的老作家、世纪同龄人冰心女士。有三、四十年代（“左联”、延安时期）的老作家周立波、欧阳山、舒群、姚雪垠、韦君宜等。还有一大批承前启后的中年作家。这批中年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五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被迫搁笔二十余年，新时期回归文坛的王蒙、陆文夫、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他们历经沧桑，已趋成熟，新时期以来他们的佳作如“井喷”般涌现出来；另一部分是创作起步较晚（新时期才开始）但起点较高的蒋子龙、张洁、刘心武、周克芹、古华等，他们有较强的生活和艺术准备，厚积速发，在文坛一露面就以不凡的身手引人注目。还有新时期陆续涌现出来的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王安忆、铁凝、梁晓声、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柯云路、李存葆、莫言、徐星、李晓、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王朔、苏童等等。他们的出现，像一股股“活水”，在社会主义文学大河中激起了层层新浪。八十年代初，著名作家丁玲曾用“五世同堂”来说明新时期作家队伍多层次的构成格局，现在看来，这个概括仍是适用的。

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大潮的推动下，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表现在多方面地反映了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和要求，与人民共心声，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要着重解决的时代课题，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两个，一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恢复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治疗十年动乱给国家、群众造成的严重创伤。另一个是继续解放思想，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主潮（主流）在反映以上两个时代课题方面——即反映全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方面，是表现得比较敏锐的，自觉的，是和时代同步的。

让我们简单追溯一下新时期小说潮流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点。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小说中最先出现的一股创作潮流。尽管它的出现曾引起过一场争论，而且至今不乏贬抑之辞，但是，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问题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研究，就会看到伤痕文学在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作用，恢复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它以独特的艺术思考，深刻的思想力量，触及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尖锐课题，引起了社会的反响。谢惠敏作为第一个受了精神内伤的人物，进入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紧接着，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发表，作品通过一个家庭的惨变，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触动了成千上万个受害人的心灵创伤，引起了共鸣。此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枫》（郑义）、《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献身》（陆文夫）、《生活的路》（竹林）等一大批揭露“文革”带给人民的灾难，歌颂党和人民同“四人帮”作殊死斗争的悲剧性作品，如潮水般涌现，成为当时文坛令人瞩目的现象。

接着，《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布礼》（王蒙）、《土壤》（汪浙成、温小钰）、《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芙蓉镇》（古华）等一大批作品，敢于触及重大的社会矛盾，从

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建国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历史道路进行反思，深刻揭示出发生历史悲剧的原因及教训，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思”的创作潮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云山传奇》这部颇具胆识的力作。它率先突破了题材的禁区，把“反思”的触角指向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表现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纠正等二十年前后的社会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形象地展示出各类不同人物的人生道路及其道德情操，令人掩卷深思。《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尖锐地揭示了六十年代初发生在我国农村那场大灾难、大悲剧的主要历史原因：天灾、谎祸，塑造了一个罕见的英雄形象——为了救活全村百姓甘当“犯人”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李铜钟的形象。反思文学，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在高期潮之后，继续深入发展，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作品。王蒙的《蝴蝶》、李国文的《月食》、韦君宜的《洗礼》、张贤亮的《绿化树》、王安忆的《流逝》等，从新的角度探索和思考干部或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而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以及毕淑敏的《昆仑殇》，等，则明显具有将“反思”和“伤痕”融为一体的特色，作品中渗透着批判意识，使悲剧带有很强的警策力量。

与“反思”文学同步兴起的是“改革文学”创作潮流。从揭露伤痕到反思历史，再到讴歌改革，创作思潮的变换更迭，既是时代和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的要求，又是符合艺术内在规律的必然变化。主张作家要“拥抱生活”的蒋子龙，在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炮打响后，又写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作品，描绘了工农业战线的改革新貌，揭露了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使人们看到改革之路既不可阻挡又艰难崎岖。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以一幢俄式别墅前后五十年间主人的更换为背景，反映了选择接班人这一关系到

改革大业成败的问题，是一部有深度、有新意的作品。何士光的《乡场上》以凝炼的笔墨写出了发生在乡场上的一个小风波，却折射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农民命运的变化。湛容的《人到中年》因提出了我国四化建设中急待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外，《祸起萧墙》（水运宪）、《男人的风格》（张贤亮）、《钟鼓楼》（刘心武）、《都市风流》（孙力、余小惠）、《新星》（柯云路）、《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贾平凹）、《苍生》（浩然）、《麦客》（邵振国）、《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刘兆林）、《两代风流》（刘亚洲）、《井》（陆文夫）、《女儿经》（程乃珊）等等，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改革时代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描绘了改革大潮在城市、乡村、军营等各个领域所激起的浪花，表现了社会变革对人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我们的社会变革在日益深化，文学反映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

如果说在最初几年的新时期文坛上，“伤痕”——“反思”——“改革”独领风骚，小说创作尚有主流可循的话，那么，1985年以后，随着社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观念的更新以及“文化热”的兴起，小说创作领域则是新潮迭出，流派纷呈，此起彼伏，各显神通，“寻根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等等，使文坛出现了纷繁交错、更新变异的景观，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

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寻根”浪潮，它的兴起，是由于一些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主张和他们的创作实践。他们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要写出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表现传统的文化心理，展示地域的文化风貌。一批具有深邃的思想意蕴和厚重的历史感的小说，成为“寻根”创作潮流的代表性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

郑义的《远村》和《老井》、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通过“人生”的视角和历史的目光，对过去的生活进行艺术观照，从而把握生活发展的进程，表现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引起人们对于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思索。阿城的代表作《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有一种淡泊自守而又积极进取的性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体现。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远山野情》和《商州》等十几部作品组成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等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郑万隆表现东北边陲山野丛林中人们的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都展示了地域的不同文化风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纪实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兴起，似乎更加受到一般读者的注意。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张辛欣、桑晔的“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近百篇，同时在《收获》、《十月》等五个刊物发表），形成了纪实文学的一大潮头。作家及时捕捉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新信息，选择为大多数人所密切关注的社会性课题，予以艺术地表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适应了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生活、求真求实的社会心理。此外，冯骥才写了《一百个人的十年》，真实地记录了普通人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是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还有邢卓的《祭日》、杨菁的《往事》、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乐欣的《路易斯女士在中国的奇异经历》等，都是纪实小说的佳作。通俗文学拥有十分庞大的读者群，这一文学大潮的涌现，打破了纯文学独占当代文坛的一统天下。通俗小说，包括传奇小说、武侠小说、法制小说、旅游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性和扣人心弦的传奇性，以及通俗易懂的语言，适应了一定层次读者的阅读心理，满足了群众不同的精神生活需求。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冯骥才的《神鞭》、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等，但是，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内容平庸，情趣不高，质量较差。

新写实小说是1987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潮流。代表作

家作品有方方的《风景》、《落日》、《祖父在父亲心中》，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黑的雪》等，以及范小青、叶兆言、李晓、李锐等的作品。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它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钟山》1989年第3期“卷首语”）显然，“新写实小说”这种新的创作倾向是有着属于自己的审美特征的。它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真诚地面对现实和人生，不回避生活的平庸、尴尬甚至悲惨。这似乎和传统现实主义十分接近。但是，新写实小说所着重描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本相，是生活的原生形态生活的质感，它所着重表现的是生活的原汁原味和细微的、琐屑的生活过程，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无所不包。《烦恼人生》像流水帐一般地“记录”了一个普通工人充满烦恼的一天，把生存状态置于首位，人物不过是体现这种状态的工具。《单位》进而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群体生存状态。《太阳出世》写一个婴儿的诞生，《落日》写一个老人的死亡，都把这生或死的过程写得很细很细，似乎意味就存在于过程之中。同时，新写实小说情节平易化，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人为的矛盾冲突。作品主人公也都是一些极平凡的小人物，活得很累的芸芸众生，如印家厚（《烦恼人生》）、男小林（《单位》）、七哥（《风景》）、杨天青（《伏羲伏羲》）等。此外，新写实小说在艺术上虽以写实为主，但借鉴和运用了象征、荒诞、变形、魔幻等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手法，使作品达到了“总体写实而兼收并蓄”，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相结合。

新时期小说创作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和失

误，出现过一些思想倾向不尽健康的作品。一些在艺术上缺乏功力的、粗浅的作品也时有出现。但是我们相信，小说创作之舟是会沿着正确的航程驶向彼岸的。（汪时进）

第二章 王蒙 刘心武 蒋子龙

一、王蒙

王蒙，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34年生于北京。1948年入党。1953年开始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先后到北京郊区和新疆伊犁劳动。1979年回北京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文化部长。

新时期王蒙复出以后的新作，除了少数几篇采用传统的情节结构外，大多数借签了意识流、荒诞、象征等表现方法。他掷出的《布礼》、《夜的眼》、《风筝的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一组“集束手榴弹”，在中国文学河床里，形成了一阵“意识流热”。王蒙是这个潮头的弄潮儿。

为什么要采取突破常规的“意识流”新写法？

首先是作者真情实感表现的需要。二十年的人生坎坷与“二度青春”再现的复杂经历、复杂思想、复杂感情，需要复杂化了的表现形式，于是“上下古今中外的求索”，终于求得了“突破时空限制”的以心理结构为中心的“意识流”新写法。当然更是作者对时代需要的感应。新时期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使现代人的社会经验、心理活动大大复杂化了，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了，读者欣赏文艺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需要相应的快节奏与具有更大深广度的新写法表现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心灵。这种写法，虽然是受到西方潮流影响的，但王蒙却剔除其灰色变态神秘色彩，排除其非理性脱离现实的成份，将其改造并融入包有杂文笔法、意境描写、抒情笔调、单口相声、荒诞变形等多种写法的现实主义之中，为展示“八千里”和“三十年”中包涵的巨大内容，为表现社会化了的“我的心灵”的悲歌欢笑发挥着高效能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个创造。